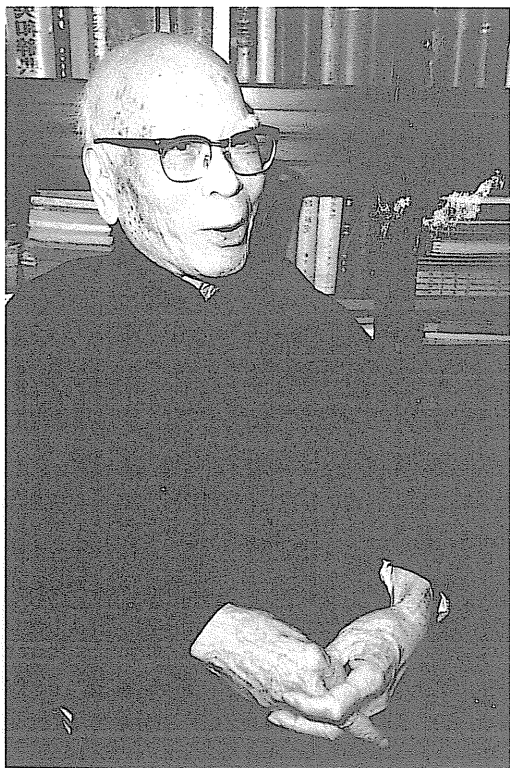


## 楊雲萍 (1906~2000)

楊雲萍先生，台灣新文學運動第一期的重要詩人，是台灣第一份白話文雜誌的創辦者，同時也是研究南明史的學界泰斗；許多當前台灣史家如黃富三、張炎憲、吳密察、林瑞明等，都是他的學生。葉石濤曾對楊雲萍的作家身分給予了如此的文學定位：「楊雲萍一生的創作不多，但是從古文到白話文以至於日文，從舊詩、新詩到日文現代詩、小說、評論、散文、學術性專文，其涉及領域既廣且深，可以說是臺灣作家中地位最特異的作家。」



此照片由楊黃月裡女士提供

楊雲萍，本名楊友濂，公元一九〇六年出生於台北士林。祖父為士林宿儒，亦為區長，父親是醫生，在當時是少有的「仕紳」家庭；楊雲萍自幼在祖父的教導下，受到良好的漢文教育，對漢文有極深的鑽研。中學時，考入台灣總督府台北州立中學（建中前身），是該校僅有的兩名台灣籍學生之一，此與其日後優秀的日文造詣應有相當的關係；學校裡的日籍老師今村新也建議他要多讀古書，因此楊雲萍在國學古文方面有很好的根基。而江父因為經營人參行，做漢藥生意，經常往返中、台兩地，因此家中常有中國白話文雜誌，如《小說月報》、《東方雜誌》、《星期六派》等，楊雲萍因此有機會接觸白話文作品。如此的教育背景，促成了楊雲萍成為日治時期新文學作家之中，少見的古文、白話文、日文俱佳的作家，而創作作品更廣含了舊體詩、新詩、散文及隨筆等。

一九二四年，十八歲的楊雲萍開始投稿到《台灣民報》上，筆名雲萍生，發表了文言札記、白話論文、小說、寓言、新詩等等，甚而與文壇前輩筆戰，當時有人死守文言文，他與張我軍則力持白話文的重要性。從這裡可以看到文學作者在摸索試探的創作痕跡；同時，這項經歷亦顯示，比賴和晚生十餘年的楊雲萍，似乎早一步走進了白話文寫作的園地。少年楊雲萍，以各種筆法、各式文體嘗試創作多樣的文章，其中甚至包括批評時事的論文，而在當時引起日警的注意。

一九二五年三月，楊雲萍與友人江夢筆合力創辦了台灣第一本白話文雜誌——

《人人》。這本雜誌只有十餘頁，發刊詞上面註明是「器人雲萍個人雜誌」，「器人」是江夢筆的筆名。《人人》只出了二期，內容卻相當多樣，有散文、小說、新詩、古詩、短論，也有翻譯詩；第一期絕大多數是楊雲萍的作品。《人人》的構成團體實為一鬆散的文學結社，秉承楊雲萍等人年少時對祖國新刊物的嚮往，而對舊文化提出改革，同時提倡白話文的社會功能大於實質創作的藝術價值。《人人》第二期出刊時，江夢筆已到中國定居，而鄭作衡（縱橫）、鄭嶺秋、江肖梅、張我軍等加入，張我軍的《亂都之戀》有一部分刊於此。江夢筆後來返台投淡水河自殺，《人人》也沒有再辦下去，但它開啓了白話文創作的先聲，只可惜無法像《台灣民報》那樣，成為新文學的重要舞台，反而是楊雲萍加入《台灣民報》陣營，重要的作品都發表在這裡。

當時適值台灣新舊文學論戰發生，代表舊文學的連雅堂全力反對新文學，批評主張新文學的人是——「誠坎井之蛙不足以語汪洋之海也」。楊雲萍在白話文雜誌上發表古詩《吟草集》是有意的，他說：「《吟草集》是我的舊詩集，本擬在《人人》連載，可是僅刊登一期，就沒繼續下去了。原因是看不起舊體詩。原來想把《吟草集》刊出的動機，是一點賭氣的意思的。」就是說：「我們之反對舊詩、舊文，並不是我們不懂舊文學，或是不會寫作舊文學；而是因為舊文學已沒有存在的價值，故反對耳。」這番話是足以讓反對新文學的人閉嘴的。所以多年後，連雅堂和楊雲萍見面時，連氏說：「當年，我以

為你才配攻擊舊文學，因為你懂得舊文學！」而楊雲萍又透過日文的媒介，兼備了近代文學素養；漢文與日文雙重文學經驗的兼備，使得楊雲萍不論置身於第一代漢文作家之列，或二〇年代以降以日文為創作工具的新世代中，都顯得相當特殊。

二〇年代社會主義狂飆，民族自決的呼聲於世界性風潮中甚囂其上。一九二六年，楊雲萍赴日讀書，先入日本大學文學部預科，再入日本文化學院大學部文科，著名的日本作家菊池寬和後來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川端康成都任教於此。楊雲萍於此年五月首先加入「東京臺灣青年會」，並且擔任評議員；一九二七年再參與深具左翼色彩，由黃宗堦、陳來旺、楊達、許乃昌、賴遠輝……等人主導的「社會科學研究部」，然不久後即退出。

楊雲萍在一九二六年起的六年留學日本生涯中，曾寫過一連串批判殖民地社會陰暗面的小說，如：〈光臨〉、〈黃昏的蔗園〉、〈秋菊的半生〉……等等，堅持以藝術美學永恆的表現做為記錄殖民地歷史的施力場域。同時代的作家吳新榮（一九〇七～一九六七）以「嫌棄政治的高潔詩人」為楊雲萍定位。此一角度的觀察的確相當契合某些楊雲萍特殊的詩人氣質，然而在此之外他開始延伸觀照殖民地下的歷史與文化。

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的決戰時期，日本帝國挑起太平洋戰爭，高倡大東亞共榮圈，全面動員納入戰時體制，文學領域亦遑論自主性的堅持，許多作家被迫謳詠戰爭，做出違心之論。決戰時期可謂是楊雲萍在文學創作、民俗研究兩方面的活

躍期，當時其所參與的大多為日人主導的活動團體，包括「臺灣詩人協會」、「臺灣文藝家協會」、「文藝臺灣社」、「民俗臺灣」等。而「嫌棄政治的高潔詩人」，說明楊雲萍對現實關懷角度以及文學藝術表達形式的選擇，此與其走向民俗歷史研究皆為文化抵抗的表現。

楊雲萍並且為追尋殖民地臺灣文化的自主和尊嚴不斷努力：在第二次「大東亞文學者決戰會議」中，楊雲萍質疑日本文學界對於臺灣文學的漠視，進而爭取編纂臺灣文學史的經費；隨後在「臺灣決戰文學會議」中，當西川滿三度發言將《文藝臺灣》獻上，作為「文藝雜誌的戰鬥配置」之際，楊雲萍力陳提案作為大東亞的臺灣文學史的急迫性。直至戰後初期的一元化語言政策底下，楊雲萍仍堅持主張先「奪還我們的語言」——即確立臺灣話的使用後，方能接續國語的學習。在其背後「臺灣特殊性／中國化」的文化思維順位中，不斷強調臺灣特殊歷史經驗下所孕育的文化成果不容抹煞，並先後重刊臺灣新文學之父賴和的作品，及將戰前被禁止的《臺灣小說選》序文，改題為〈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回顧〉，適時地對官方中國本位主義的文化重建政策加予正面的批判及有力的反駁。

戰後初期，楊雲萍逐漸淡出文學創作，角色轉移至新聞人（Journalist）上，藉此積極的介入現實，先後擔任長官公署參議、《民報》社論主筆及文藝欄主編、《臺灣文化》編輯組主任、省編譯館臺灣研究組主任、《內外要聞》主編等職務。「二二八事件」之後，又逐漸轉向歷

史、民俗的研究，為《公論報》副刊「臺灣風土」主要撰稿人之一。一九四七年起，楊雲萍任台大歷史系教授。

蹶起於臺灣新文學理論實踐階段，揚名於決戰時期的楊雲萍，成為一九四三年前後二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中，四位臺灣作家（張文環、龍瑛宗、周金波、楊雲萍）代表之一，同年底以日文出版《山河詩集》奠立詩人地位。楊雲萍主要的文學活動大多與在台的日人文學團體較接近，且傾向藝術至上的美學觀。其早期的新詩及小說，部分分別選入《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台灣作家全集》或《楊雲萍、張我軍、蔡秋桐合集》。

其日文詩集《山河》於一九四三年由台北清水書店出版，共收入二十四首詩。「山河」典出杜甫詩「國破山河在」。其實，詩集裡並沒有「山河」這首詩，不過是藉此表達詩人內心裡濃厚的家國之思罷了。

楊雲萍的小說創作大都精短簡鍊，也都屬於站在庶民觀點，批判、諷刺統治階級及附和他們為虎作倀的士紳。〈光臨〉與賴和的〈鬥鬧熱〉同時刊出，寫用心巴結警部大人的保正，傾力備辦了一桌酒席卻等無人，攀結大人的希望幻滅；嘲諷保正逢迎警察的醜態。〈黃昏的蔗園〉寫製糖會社欺騙蔗農，蔗農按會社的獎勵辦法投入大筆資金努力增產，會社卻巧施鬼計，讓蔗農虧了老本；批判資本家剝削、壓榨農民的惡行。〈秋菊的半生〉寫貧家女子淪落風塵、命運悲慘的一生。他的小說的精短現象，雖然可以歸因於新文學運動伊始，白話文的使用未臻閑熟，但楊雲

萍本身的文學意識，無疑也非常重要。他的文學，尤其是小說，裡面含有的尖銳的批判意識，以及強烈的抵抗精神，在在都指向他擁有知識分子的悲天憫人的天性，創作是他用來「抵抗」殖民統治的手段。或許他中止這樣的文學風格與退出台灣青年會的原因相同：他反對偏激和極端。

楊雲萍這一位「嫌棄政治」的詩人並未於動盪的時代中缺席，而極早地展開了對臺灣歷史與文化的鑽研，除了展現殖民地臺灣於既有地理、歷史條件下所形塑無可替代的特殊性之外，更成為被殖民者傳承固有歷史、文化命脈的最後尊嚴；這也正是楊雲萍的終極關懷及其選擇介入現實的方式。綜其脈絡，由文學→民俗→新聞人→民俗、歷史，之間的轉折有其於時代變遷下極為深刻的烙印，及作家內在精神歷程對應時代的思辯。（蔡佳芳）